

日本“皇国史观”思想的演进与甲午战争

○ 周新国¹, 周 隽²

(1. 扬州大学 淮扬文化研究中心, 江苏 扬州 225002;
2. 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 影视艺术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13)

[摘要]“皇国史观”又称“国体史观”, 是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 是日本军国主义动员的精神主脉。它的思想因子可追溯到公元 8 世纪以汉字书写的日本古典《古事记》、《日本书纪》和中世纪的《倭姬命世纪》所包涵的“日本神国论”和“八纒为宇”。此后, 经过日本幕府统治时期的镰仓时代的北畠亲房和江户时期的山鹿素行、本居宣长, 尤其是佐藤信渊、吉田松荫和福泽谕吉等人的阐发、发酵, 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先导。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是日本“皇国史观”的重要实践, 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实现了兼并朝鲜、侵占台湾的目标, 进而推进其“称霸世界”的战略, 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日本整个国家推向毁灭的边缘。

[关键词] 日本; 皇国史观; 大陆政策; 甲午战争

“皇国史观”又称“国体史观”, 是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 是日本军国主义动员的精神主脉, 认真研究日本“皇国史观”思想的演进及与甲午战争的关系, 对进一步研究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侵华战略有重要帮助。本文拟就此作一分析。

一、日本“皇国史观”思想溯源

日本“皇国史观”的思想因子, 可追溯到公元 8 世纪以汉字书写的日本古典《古事记》(公元 712 年成书)、《日本书纪》(公元 720 年成书)中已有呈示。至中世, 伊势神道的五经典之一《倭姬命世纪》宣称:“大日本神国也, 依神明之加

作者简介: 周新国(1951—),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江苏省史学会会长, 扬州大学淮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周隽(1981—), 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影视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被”。此种神化日本的“神国论”和由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大帝”臆想的“八纒为宇”理论直接推衍出日本海外扩张和侵略的思想因子。所谓“神国论”实际就是神化天皇、神化日本,延传至近代就形成“尊皇爱国”为主旨的皇道主义;^[1]所谓“八纒”意指四方四隅,该词原出自中国典籍《列子·汤问》、《淮南子·地形训》,日本最初的古典《日本书纪》即以此词,编造神武天皇建都诏书,内称:“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纒而为宇”,意欲将世间八方置诸一字之下,而这个“一字”,便是日本天皇的统治。这种将“神话”当作“肇国的事实”及“自古以来的国家信念”以及蕴含于日本意识中的所谓“万世一统”“天壤无穷”^[2]的“国体意识”,可视为内在于日本思想深处的“皇国史观”的历史意识的思想因子。

日本幕府统治时期的划分,学界一般划分为三个时期:镰仓时代(1185 - 1331)、宝町时代(1336 - 1573)和江户时代(1603 - 1867)。对于广义的“皇国史观”的形成,一般只是追溯到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的儒学者和国学者的“国体论”和“尊皇论”。^[3]中国学者刘岳兵认为在幕府时代早期的“镰仓末期北畠亲房所著《神皇正统记》将神道、儒学、佛教各种思想资源加以整合,在促使皇国史观形成一种理论化的形态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4]北畠亲房(1293 - 1354)所著的《神皇正统记》的目的就是要力图理论地、历史地论证日本是“神国”,其中儒、道、佛各种思想实际上都成为其论证“大日本者神国”这一论断的精神资源。北畠亲房还利用了中国的阴阳、五行、五德相生的理论,论证日本“神国”的主体性和正统性。其核心思想则直接来自于中世纪《倭姬命世纪》中提出的:“大日本国者神国也。依神明之加被,得国家之安全;依国家之尊崇,增神明之灵威”,是近代日本“皇国史观”的重要思想资源。

作为日本“皇国史观”思想资源的“神国论”和“八纒为宇”之说并非是虚幻的泛泛说辞,它实际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精神资源,成为日本“皇国史观”思想构架的内核。此后日本多次发动对朝鲜、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都可以看到其作为发动战争的思想内核。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丰臣秀吉在16世纪末期两度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占领朝鲜开城、平壤,宣示要迁都明朝京师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明朝,他甚至还梦想远征印度,“统一天下”,终因中朝联合在陆战和海战中击败日军,丰臣秀吉败归,后于1598年一命呜呼。然其“必图朝鲜,窥视中华”的扩张侵略的理念则是体现践行“神国论”和“八纒为宇”思想的体现。

二、日本“皇国史观”的确立与演进

丰臣秀吉败归后,继起的德川家康建立的幕府属于江户时代,虽行“锁国体制”,但其对外侵略扩张之意并未消弭,仍存“掩八纒而为宇”的日本“神国”思想。

江户幕府初期,山鹿素行著《中朝事实》,称日本为世界中心,讴歌“忠节”、“尚武”的“武士道的精神”,为近代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的渊源之一。

江户幕府中期,本居宣长等人宣传“神国”日本统治世界,将日本古书《古事记》描述的“天照大神”视为实际帝王,赞颂“神道”为日本文化的原始精神,力主

“复古神道”以清除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江户幕府后期,日本遭到西方列强欺凌侵略,日本一批思想家从各个方面提出挽救危机的方略,其主流意向是一批受“神国论”影响的藩士提出的主张,其中著名人物是佐藤信渊、吉田松荫和福泽谕吉等人。

佐藤信渊在其所著《宇内混同秘策》中提出:“安抚万国之苍生,自始便是皇国君主之要务。”并说“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其提出的计划为: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并进一步提出:征服支那之后,再图东南亚、印度,成为近代日本“皇国史观”的确立和军国主义侵略方案的先导。

吉田松荫是日本江户幕府末期鼓吹“神国论”的代表人物,其在西方列强侵犯日本之后,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思想,他在《狱是帖》中提出:“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洲之土地以为偿。”吉田松荫还提出了“控制南洋而袭印度,为将来吞并五大洲作准备”的战略构想,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前导。吉田松荫在其创办的“松下村塾”里,还培养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和明治维新的重要骨干。

1867年,德川庆喜在倒幕中被迫宣布还政“天皇”,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同年,明治天皇发表《宸翰》,宣布“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欲将天下疆域收入治下,是日本统治阶层千余年的梦想,其目标首先是邻近的朝鲜、中国的台湾以及中国的东北,而整个东亚大陆乃至全世界则为其“远大目标”。同时,日本明治政府明确“神皇绝对权威”,宣传“神道”。

1869年颁布《关于修史的命令》提出“扶植天下之纲常”的“八纮为宇”的思想。1882年颁布《军人敕諭》鼓吹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天皇神道的独一无二”地位;1890年颁布《教育敕諭》推行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

在这一时期,阐发“神国论”和“皇国史观”的重要人物还有福泽谕吉等人。其中福泽谕吉力倡“文明开化”,学习欧美,与其“共进退”;同时把中国、朝鲜等亚洲邻邦视作“野蛮未开化”的“恶友”,予以抛弃乃至侵袭;鼓吹“脱亚入欧”。1887年所著《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成为甲午战争的预言。同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略”,成为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之端绪,其提出: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八纮为宇”,标志着日本“皇国史观”指导下的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和称霸世界战略的确立。

三、日本“皇国史观”思想在中日战争中的实践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初年对中国尚有畏惧之心,经过了1874年日本侵台

事件、1879年吞并琉球等试探之后，已摸到清朝政府妥协软弱的底细，滋长了其轻华、侵华的野心。一批受“皇国史观”和“八纮为宇”思想影响的明治维新政府领导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继承、发展并实践了日本“皇国史观”和“八纮为宇”思想，鼓吹“征朝论”、“征台论”和“大陆经略论”，成为推行和实践“皇国史观”指导下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领导人。

1890年，日本明治政府首相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国会上提出了“主权线”和“利益线”概念，强调朝鲜是日本的利益线，为确保利益线，进取中国是第一要务。从而将“皇国史观”指导下的对朝、对华的侵略战争的命题，从实践角度提上了国会讲坛。

同时，为扩军备战保证军需，日本政府以国家财政收入的30%作为军费，明治天皇宣布每年从皇室经费中拨款30万元补贴海军，全国官员以10%的薪俸作为捐款于海军建设，半年之内，从首相伊藤博文到各地贵族、富豪为海军捐款达200万日圆。日本政府还发行海军公债超过1700万日圆，以此形式筹集资金，几乎举国一致地支持“皇国史观”影响下的“国运相赌”的战争冒险。

在日本第四届国会上，明治天皇明确提出了“兼六合而掩八纮”，实际上是批准了对华对朝发动侵略战争。

在此前后，日本发动对华情报战，在中国建立的东洋学馆、日清贸易所等间谍机构，伪装为僧人、学者、商人等的日本间谍活跃在中国各地，说着流利的汉语，侦察、收集有关中国的各种情报，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到地理山川和风土人情无所不包。

日本的政客和各式各样的媒体竭力为即将到来的“义战”摇旗呐喊，形成了举国上下要求出兵海外的异常兴奋的状态，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通俗歌谣、图画、报纸、杂志和戏剧充斥列岛。

1893年，日本政府成立“出师准备物资经办委员会”，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日本发动对华、对朝的侵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此时，日本陆军能够出国作战的机动兵力有“7个野战师团12多万人，海军共有大小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为6.1万吨”。^[5]

此时，对日本来说，唯一缺少的就是战争借口。1894年春，朝鲜半岛发生东学道农民起义，李氏王朝于同年6月3日向清政府请求“遣兵代剿”。日本喜出望外，居心叵测怂恿清政府出兵，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政府信以为真，派出直隶总督叶志超带兵2000人开赴朝鲜。

日本诓骗清政府成功的同时，1894年6月5日，日本正式成立了由天皇统辖的以参谋总长为幕僚长、参谋次长为陆军参谋官、海军部长为海军参谋官的战时最高机构——大本营。同日，一批日本海军开赴朝鲜汉城。当清军叶志超率部队于6月12日到达朝鲜牙山时，日本混成旅团7000余人已进驻仁川，与清军形成对峙，实力超清军。此时，朝鲜东学道农民起义已经平息，“平叛”、“助剿”的借口已不存在。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朝鲜也希望日军撤兵。日本

不仅拒不撤兵,且继续增兵朝鲜,并以“改革朝鲜内政”为名。7月25日,日军攻入汉城王宫,驱逐国王,组成亲日的傀儡政府,实现其“大陆政策”的重要一步——占领朝鲜。接着,日本海军无视国际公法不宣而战,在仁川附近丰岛海面袭击了清政府雇佣的英国公司3艘运兵船“高升”号、“爱仁”号、“飞鲸”号,并击沉“高升”号,同时击毙落水者,致使800余名清军葬身大海。

1894年8月1日,日本对华宣战,“战时大本营”迁到广岛,日本天皇以大元帅身份到统帅大本营,举国一致的战时指挥体制正式形成,日本从陆海两个战场侵犯中国领土,实施其“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又一步。

1894年9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海域与清北洋舰队进行海战,结果北洋舰队5艘军舰被击沉,4艘受伤,损失惨重;日本联合舰队,仅4艘舰重伤,并取得了黄海的制海权。

与此同时,山县有朋大将率领日本陆军第一军从朝鲜过鸭绿江,新编第二军登陆中国花园口,两军同时入侵中国本土,攻陷旅顺,进行了连续4天的大屠杀。此时虽进隆冬,日本军队在中国山东荣成登陆,从后路包抄,与日本联合舰队协同作战,陆海夹击,将北洋舰队围困在刘公岛军港,致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此后,清政府派出李鸿章等赴日本马关与伊藤博文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日《马关条约》。

中国与日本的甲午战争是日本“皇国史观”与“八纮为宇”战略思想指导下的日本军国主义“国运相赌”的战争冒险。日本在此次战争中得到了从未有的巨大的战争利益。据记载,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死亡的军人约为1500人,其中85%为病死。然而日本从战争中得到的回报却是极其丰厚的。日本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不仅取得对朝鲜的控制权,夺占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获得白银2.3亿两(含3000万两赎辽费)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和在华投资设厂等特权,还获得价值1亿多两白银的战利品。首次对外战争赌博使日本获得意想不到的巨额回报,朝野上下狂妄自大,野心膨胀,纷纷推出各类“视捷会”、“慰灵祭”和“战争纪念碑”等,日本国内笼罩着一种“大国崛起的民族意识”,“大国,大国民”、“神国”、“大和民族”、“雄飞海外”的论调充斥于世,日本各界几乎无不为日本战争的胜利而兴奋、自豪。

甲午战争是日本“皇国史观”确立的标志,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八纮为宇”思想的一次重要实践。日本打败了大清帝国,改变了东亚几千年来华夷秩序,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的霸主。甲午战争是近代中日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日本对华关系转变的一个重要拐点。从此,中日关系完全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军部揽权,军国主义的宣传和军国主义教育使日本人心理更加扭曲。1903年,田中智宇把“八纮为宇”概括为“八纮一字”,宣示日本为统一全世界的霸主。从此,“八纮一字”成为日本的国家格言。其军政机构悬挂条幅分别为“武运长久”和“八纮一字”。日本岛国心理的狭隘民族主义与“皇国史观”的神国论,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与“八纮一字”思想,武士道精神的好战与法西斯主义的残暴疯狂等心态都交织混合在一起,疯狂地对外侵略

扩张,从此日本走上了一条不断对外军事侵略的军国主义不归路。

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对中国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巨痛和奇耻大辱。北洋海军的覆灭,不仅宣告中国海军的惨败,也宣告了洋务运动以来的富强努力的失败。战后中国被迫割地赔款,给中国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伤害极为严重,是史无前例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彻底戳穿了清政府纸老虎的面目,对中华民族形成巨大的冲击,促使中华民族的觉醒。甲午战争失败后,整个中国,群情沸腾,前所未有的议论,前所未有的激愤,前所未有的探求,促使中国人民重新选择振兴中华的道路。沉重的民族危机带来了新的历史转机,就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同时,千余名举人进行了“公车上书”;此后,1898年发生戊戌维新运动;1900年发生义和团运动;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统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重大转折点,它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形成了强烈的要求改革、进步的爱国主义的巨大历史潮流。

中日甲午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改变了亚洲和世界的格局,大大影响了20世纪初世界力量的对比。对中国而言,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了一次赶上历史潮流的机会,并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而从长远看,甲午战败的“屈辱记忆”却使中国如同凤凰涅槃,终于一步步走向辉煌。而日本通过此次战争,“神国论”和“八纮为宇”的“皇国史观”进一步膨胀,脱亚入欧,继打败中国之后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从而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此后不断发起对外侵略战争,一步步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皇国史观”影响下的日本军国主义最终把日本整个国家拖向毁灭的边缘,也使日本和亚洲人民深受侵略战争毒害,这个历史教训极其深刻而惨痛。

时至今日,以安倍为首相的日本政府不断制造事端,渲染“中国威胁论”,修订了日本和平宪法,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年时值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我们反思中日甲午战争,必须铭记用血泪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彻底洗刷历史的耻辱;我们必须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老路保持高度警惕,必须居安思危,加强国防,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冯天瑜:《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特质》,《光明日报》2014年7月21日。

[2]永原庆二:《皇国史观》,东京岩波书店,1983年,第18页。

[3]相良亨、尾藤正英、秋山虔编:《讲座日本思想4 时间》,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第306页。

[4]刘岳兵:《“皇国史观”与宋代儒学的思想纠葛——以〈神皇正统记〉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6期,第105页。

[5]张炜:《一场日本精心策划的侵华战争》,《参考消息》2014年3月12日。